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

2019-06-11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6月9日的反“逃犯条例”游行，迎来了香港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行动。香港岛街头，尽是白衣人海。游行队伍从维园出发，走到政府总部，历时约8小时，民阵指有103万市民参与，警方数字是最高峰有24万人。

相比2003年的七一游行，这次的动员差可比拟，甚至尤有过之。当年七一游行主题虽然是反“国安条例”立法，但是当时经济低迷、管治失衡、沙士肆虐，参与者的诉求其实复杂得很。

为何今次聚焦单一议题的游行，反而令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伞后社运气氛低迷，政治高压愈烈，大家为甚么愿意为这个议题走出来，令集体行动踏上一个新台阶？

香港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

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是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亦即政治体制的开放程度、以及政治菁英的内在矛盾，会为社会上的集体行动带来助益。

逃犯条例修订的消息传出时，香港商界和部份亲建制媒体，的确曾经批评咨询程序不足，并表达对修例的疑虑。但是，当中央官员相继表态、一槌定音之后，这些体制内的异议就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早前一连串针对反对派的DQ争议、言论审查和刑事审判操作，已大大增加社运成本并约束其成效。当下的香港，反对派已经无力以立法会辩论和程序制约行政机关，建制派内的批判声音也成凤毛麟角。换言之，香港欠奉有利大型集体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资源运动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为社运的产生提供了另一种切入点。这套框架指出社会运动之所以此起彼落，是因为当代公民社会可动用的资源大增。尤其是专业社运组织的出现，令体制外抗争成为常态。

香港的社运组织由来已久，但教协不复当年勇，职工盟的会员缩减，学联更告瓦解。就以此次游行为例，民主派的海外和社区宣传，以及议会抗争得确令议题升温，取得更多社会关注；但是，民主派拥有的资源，跟这次游行的规模绝对不成正比，许多民主派的政治明星更身陷牢狱。试问游行人士中有多少人记得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的领导层的名字？又有多少人是受民主派的号召而上街？以动员过程来看，答案肯定是少之又少。

然而，当权者的思维大抵服膺上述两套框架，所以他们既要约束建制菁英，也要打击民主派团体。这种作为近年也一度取得成效：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席大幅减少，也难以依赖工会、学生等组织动员市民。针对反对派领袖和新星的打击看似收效，但实际上摧毁了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互信和枢纽，使得政府更难有渠道去拿捏民怨，亦加剧社运的碎片化。在这种背景下，像“反送中”这样的大型游行的出现，虽然出人意表，却是并非无迹可寻。

依赖周期事件的动员脉络

笔者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当代的集体行动，更多是依赖关键事件的抗争周期（eventful protest cycle）。这类突发的社会运动，深植社会脉络，由自觉的认知牵引，在运动中创造机会和资源。意见领袖的呼吁和社交媒体的平台，固然有传播议题、集约支持和制定策略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参与者是经历了一段认知过程，再透过自发的非暴力行动，降低参与成本，建立互信和连结。

最明显的例子是大游行前各大中小学的网上联署。联署的构想来自任教中学的老师，联署的许多发起人，却是没有政党和团体背景的政治素人。根据媒体对发起人的访谈，这些政治素人既要收集足够的资料来核实联署人身份，又要避免收集过多的资料令人却步。在这个过程中，学校的标签（identification）提供了集体行动的网络和渠道，使得签名、确

认、联系、发布等看似简单的行为，构成了一场低参与成本，却“充权”的洗礼。而其他团体的联署，也跨越年龄、阶层和界别，并有不少雨伞运动参与者的影子。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到了游行当日，示威者身著清一色的白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不满，既是响应主办单位的呼吁，也是集体意志的宣示。数十万人参与的游行不单没有出现打砸抢，还主动收拾现场垃圾，这是西方民主社会也不多见的公民素养。这些壮观的集体行动，除了创造政治机会，赢取国际社会同情，更在于建构集体身份。

事实上，明报现场民调发现，有33%的参与者是第一次参加游行，有83.7%是因为担心一国两制和司法独立受冲击而上街。学者和传媒的街头访问也显示，参与者来自不同政治光谱，却大多对修订有一定认识，并不是单纯被专业社运组织影响。虽然他们不认为其行动可以改变政府决策，却无碍他们互相砥砺前行。纵使香港人对如何争取抽象的民主理念有不少分歧，但是，对于守护法治和自由等现行秩序，他们却有足够的认知。法治自由，是不同年龄层和界别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建立事业的基础，而政府至今提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支持仓促立法。

所以大规模的动员看似有无形之手有推动，其实深陷香港的历史脉络。这个边城本来就是流亡异见者的集散地，避秦南来的移民构成了香港人的主体。平日里，他们倾向远离政治，埋头工作，但情感上，他们抗拒官方的国族修辞和傲慢态度，更坚定守护这座边城的独特价值和制度。所以每逢关键事件，这种历化文化孕育出来的基因，便迅速发酵，令心态认知和集体行动变得异常顺畅。1989年的大游行如是，2019年的大游行亦如是。

捉错用神的政治傲慢

由于缺乏另类的分析框架，加上政治修辞的需要，政府断定群众运动必然是有预谋、有组织，并顺理成章得把大型群众运动视为敌我矛盾。国际社会和外国商会的担心，固然是外部势力干预；反对派领袖的游说，更加是罪魁祸首的罪证。参与集体行动的市民，则被归纳为欠缺独立思考、盲从组织的羊群。这样的思维，谈不上安抚民怨，只会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2019年6月9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虽然参与游行人士，理智上并不指望政府会让步，但或多或少希望取得为政者的尊重和合理回应。当广泛的民众明确表态，换来的却是政府已经聆听到市民声音、但决定如期在立法会恢复法案的二读。这到底是甚么逻辑？政府应该明白，在大游行之前看似有效的压制手段，不能带来长治久安，反而适得其反。政府动辄诉诸“秩序”的修辞，也并非万试万灵。对昨晚立法会外的没有预警的激烈行动，被捕者竟然大部分是大学生；民主派以至不少意见领袖，一改以往“捉鬼”的判断，纷纷表达谅解和同情。这种心态的突变，令这场大游行的后续发展，更加严峻。

香港人很悲情吗？

有两位台湾社会学界的朋友，曾经不约而同的对我说：“香港人，其实很‘悲情’”。听后心有戚戚然，难断对错。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原因，是香港到底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苦难和磨练，不必也难以像台湾般追逐转型正义，以建立主体意识。何况，香港的公民教育向来积极建立公民的主体性，庶民生活中也酝酿了多元的价值观，周期性的抗争更孕育了韧性的政治参与形式。

但我同意的是，香港人的政治诉求纵使卑微，大抵只是希望维系边城内的自由和法治，但是在中美冲突频仍，中央政府的天花板愈降愈低，特区政府一往无前的势头下，香港人的抗争似乎变得“不合时宜”。其中的忧郁无奈，庶几近之。

（郑炜，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评论

郑炜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7.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8.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9.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2.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3.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4.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5.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6.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7. 白杰明：时代的回旋——“未来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
8. 韩粉的告白：坚决“非韩不投”，即使他确实有点草包

9. 郑炜：欠缺政治机会和组织的香港，为何突然走出社运低潮？

10. 反《逃犯条例》游行周一凌晨警方强力清场，立法会外爆流血冲突

延伸阅读

商人、社工、民运人士，《逃犯条例》修订后，谁将成为“逃犯”？

“开头不会乱碰香港商人吧，但以后我们不敢有任何表态，连社交媒体、whatsapp都要小心。”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他们曾经离地、政治冷感，旁观时局，一场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为什么让他们不约而同离开舒适区，动手行动？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人流一度堵塞多个地铁站，从下午走到夜晚，队尾截至10点28分才抵达终点，部分市民深夜继续留守立法会。警方称，游行人士最高峰期有24万人。

反《逃犯条例》游行周一凌晨警方强力清场，立法会外爆流血冲突

吴木銓：修逃犯例与中央地方关系——香港需思考如何寻找平衡点

香港目前面临的情况与全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中央政府扩张权力之后，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处境。香港各界人士需要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多变的格局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台湾青年声援香港反送中：“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在乎”

一名在台湾的香港青年说，已经开始接触移民公司，但他同时说：“身为香港人，我们会坚持到最后，起码让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辜负下一代。”